我今年93岁了，回想这几十年的岁月，我领略过让人乐而忘返的繁华都市，也沐浴过令人沉醉迷恋的高原风光。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又亲眼看见、亲身感受了祖国日益强大和人民日益幸福。但如烟的岁月，如雾的往事没能挡住我的视线，故乡的模样依然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间。算了算，离开那片我经久依恋的故乡70多个年头了，每当我在宁静的夜晚凝望深邃的长空，浓浓的乡愁使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魂牵梦绕故乡情

流金岁月 庆祝建州70周年

甘孜日报社·州委老干部局联办

◎田松青

我于1927年出生在山西沁源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在故乡的那段岁月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历史印记的，莫过于万恶的日本鬼子的大肆屠杀民众，破坏劫掠财物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和家乡民众不畏强暴，英勇抵抗的斗争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沁源县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逐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那时，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驻扎在沁源，由陈赓司令，薄一波政委领导的八路军386旅、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等抗日武装也曾长期战斗生活在以沁源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当时，驻扎在山西的日本鬼子将消灭八路军和决死队当作首要任务，加之沁源民众的抗战意志坚定，表现出坚强不屈，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所以，鬼子将沁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接二连三对沁源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用各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对沁源人民痛下毒手，进行了一次次血腥的大屠杀，制造了无数起烧杀惨案。

我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膝下有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二。由于鬼子经常性的空中轰炸和地面扫荡，我们的家没了，一家人只有将窑洞、树林中的干燥地等凡是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当成家。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母亲是个“小脚女人”，鬼子来了转移时经常由父亲背着她走，不过她的双手非常灵巧，是个针线活和织布能手，她用灵巧的双手为部队纳了不少鞋垫，织出的布为部队制了不少的军鞋、被服。我父亲也非常能干，种地是一把好手，思想也非常积极，经常自发组织村民为部队抬担架，将部队伤员接到窑洞里养伤，那时候部队药品非常紧缺，父亲就上山采草药给伤员敷药。他还经常随部队一起去拆桥梁、轧公路，阻断和破坏鬼子的交通。

1942年，日本鬼子大举进攻沁源，意图占领沁源县城，沁源人民和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把所有水井填死、磨盘砸烂、粮食运走后全部转移了出来，留了一座空城给鬼子。面对鬼子疯狂的扫荡，沁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沁源围困战”，在鬼子的补给线上遍布地雷，将鬼子死死地围困在沁源县城。困兽般的鬼子隔三差五就出来抢劫，屠村，手段极其残忍。由于日本兽兵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我姨妈就是身怀六甲转移不及时被日本鬼子抓住，当时，日本鬼子用刺刀把她的孩子从腹中挑了出来，然后将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直至死亡。所以那时每家每户对自家的女孩看管很严，从不让女孩子抛头露面，我父母也不例外。

我本来念过两年的书，鬼子来后学校没有了，书念不成了，平常痛我、爱我的姨妈又被日本鬼子折磨致死，这些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发现老是躲不是办法，得跟鬼子拼命。于是我背着父母参加了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由于有点文化，我很快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担任了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秘书，我们积极动员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

尽管那时抗战的烽火将山西沁源烧得遍地通红，但由于爱女、护子心切，我的父母亲对我的管束非常严格，根本不让我出门，而我呢想尽一切办法偷偷跑去参加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活动，每次回到家父母都会严厉的批评我。为了能管住我，不让我成天抛头露面，父母背着给我找了一个婆家。听说对方男孩子只有11岁，当时我15岁，若应了那门亲事，我就要去他家当“童养媳”，安分守己当家庭妇女。为了自由、为了继续为抗日做点事，我选择了背叛父母，和几个同伴商量好后离家出走，找到牺盟会来到邻县平遥县。

平遥和沁源不同，是游击区。有维持会，有汉奸，还有阎锡山的“匀子军”（解放前山西一带群众对阎锡山十九军的一种蔑称）。维持会是两面派，汉奸就是日本鬼子地地道道的爪牙，“匀子军”也要抓捕共产党游击队。到了平遥，我们参加了平遥一区县大队，大队长名叫李康，他将我们视作骨干，把我们都编入了抗日武装小分队。让我们化装成逃荒者与维持会汉奸打宣传战。一年里，我们走遍了平遥一区的山山水水。

那时，我们不但要承担站岗放哨和宣传任务，还要在鬼子进村扫荡时从背后袭击鬼子，引开鬼子为老百姓转移赢得时间。每当听到我们部队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与日本鬼子的鬼哭狼嚎声交织在一起，看见小鬼子抱头鼠窜的狼狈样，我经常高兴得整夜难眠。

到了秋收季节，我们就更忙了，要去挨个提醒老百姓赶快收粮，并组织人员和老百姓一起抢收粮食。那时，日本鬼子和阎锡山的匀子军每天手持刀枪把老百姓赶到地里，逼迫老百姓为他们收粮食。由于敌众我寡、武器简陋，我们根本没法与之抗衡，于是我们就让老百姓上午磨磨蹭蹭，下午甩开膀子加油收，晚上就把日本鬼子和匀子军还未拉走的粮食藏到老百姓家中。有一次雨后的夜里，我们去执行任务，我的脚被陷在泥土中，鞋丢了，光着脚走了一晚，第二天，我双脚红肿根本无法下地。于是，大家就把我隐藏在一个老乡那里养伤。日本鬼子和匀子军三天两头进村搜索，老乡只好把我藏在他家的羊圈里，养了十几天的伤，我的身上也出了一身的虱子和跳蚤。养好伤，老乡给我准备了一双鞋子，还给我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让我扛着锄头装扮成小媳妇转移。临走老乡一再嘱咐我，在北方走夜路一定要记住“前方最亮是水，前方最黑是稀泥，要止步绕道；前方灰色便是路，可以前行”。后来我把这条经验传授给了我的战友们。

1943年秋收的一天，我们小分队和老百姓一起正在地里抢收粮食。由于汉奸告密报信，我们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了，经过殊死搏斗，我们只有少数人突围出来，其余的部队战士和小分队成员都牺牲了。冲出包围圈后，我和孙秀英、宋光珍还有5个记不起名字的女同志躲进了玉米地，另外有5名女同志躲进了高粱地。而我们小分队的男同志施本哲和王丙荣为了掩护我们突围，被日本鬼子抓住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兽性大发，对施本哲和王丙荣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割耳、挖眼等酷刑，最后还将施本哲的生殖器割了下来，敌人将他们折磨致死后还把他们的遗体填了枯井。我躲进玉米地后一动也不敢动，两名战友饱受折磨时发出的惨叫声令我心如刀绞，我咬紧牙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出哭声，嘴唇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痕。日本鬼子将两名战友折磨致死后，立即在玉米地和高粱地里展开搜索，搜索无果后鬼子就驻扎在玉米地边守住粮食，不让我们去抢收，直到5天后才离去。我们躲在玉米地里的队员白天一动也不敢动，晚上就在玉米地里找圆萝卜吃并不断转移藏身地，而躲在高粱地里的队员就没吃到任何东西。当鬼子撤走后，五天五夜颗米未进的她们已经奄奄一息了。由于没有经验，其中两名姐妹饿急后进食过快在我们的怀里永远的闭上了双眼。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兄弟、姐妹，他们青春、鲜活的面容如今还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向他们致敬，永远怀念他们！

亲人的惨死，战友的牺牲，家乡的沦陷，让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日益加深，那时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1943年底，平遥县委组织部长高绍吉、县妇救会主任焦桂英等在平遥举办了一个训练班，我参加了训练班。由于表现良好，在经过50多天的训练后，在县妇救会主任焦桂英和区妇救会干事郭凤的介绍下，1944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们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所有党员身份属于高度机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因为汉奸维持会要向鬼子告密，阎锡山的“匀子军”也要抓捕、杀害共产党人。

施本哲牺牲后，我接任抗日武装小分队队长职务，负责一个行政村（辖10个自然村）的群众宣传动员和各种生产生活工作。我们经常组织群众碾炸药，捣石雷，做出很多土地雷埋在敌人进村的必经之路上，每当看见被炸伤的鬼子杀猪般的嚎叫时，我们都要高兴好几天。就这样，我们消灭一个敌人就缴获一件武器，慢慢的将抗日武装小分队从当初的手持土枪、大刀长矛的队伍发展成了拥有洋枪、纪律严明的地方抗日自卫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平遥，深受日军摧残的平遥人民自发涌上街头，流着幸福的泪水奔走相告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满是胜利的标语，河谷山川尽是鞭炮的声浪。县里的戏班子免费为群众唱了三天大戏。大家一起扭秧歌、敲锣鼓，纷纷汇入欢乐的人海。那几天可能是我这辈子最激动、最开心的时刻。

我和丈夫昝英是经组织介绍认识的，抗战胜利后，组织上为了解决部队战士的个人婚姻问题，将很多地方上的姑娘介绍给他们处对象。昝英比我大十岁，是一名红军战士，抗战期间是薄一波政委领导下的决死一纵队的一名营教导员。经过组织的谈话，我成了昝英的妻子。此后，我们并肩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又共同南下到甘孜州，参加了甘孜州的政权建设、民改平叛和社会主义建设。

故乡沁源，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刀光剑影的岁月里尘封在我记忆深入的那些和我出生入死的战友、兄弟姐妹如今几乎是我梦境中的全部。享受着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的我深知生命是有限的，但对故乡魂牵梦绕的思念却是无限的。93岁高龄的我如今已经无法再回故里重踏当年的足迹，但我会将所有的思念化成一句“愿我的故乡明天更加美好。”

（作者系我州南下离休干部）

自在行走的牛

◎肖笃勇

在丹巴县城附近的马路上，会时常遭遇正在行走的牛，三五成群，或独步天下。牛犊高兴时活蹦乱跳，成年的牛都走着稳重而踏实的步伐，一副悠闲自在的神态。假若你开着车，为了安全而鸣响喇叭，有牛或靠下边，但多数的时候它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对喇叭声似乎早已经司空见惯，似乎在说这是车道人道也是牛道。你只好减速或停车避让，这时，某头牛对着你的车头“哞哞”叫唤两声回应一下，然后泰然自行而去。如果碰到一头牛正好躺卧在马路中央，瞪着圆鼓鼓、惨白带血丝的大眼睛，嘴不停地磋磨着，估计你得屈尊下车，用肢体语言和吆喝声与它交流，最好表达出友好——牛哥，理解一下，我还要赶时间。

而在小金县巴朗山飘着雪花的山坡上，在道孚县八美镇长满青草和小黄花的草场上，看见放牧的牦牛，零星分布如移动的“雪域之舟”，汇聚成片形成荡漾的牦牛的海洋，它们忍受着高寒或暴晒啃噬草和草根，那样温和、驯顺和宁静。

这是在藏区还能看到的一道牛的风景线，生命融进大自然的一种美，让我生出了感动和思考——牛何以在艰苦磨难中保持气定神闲与安身立命的生命状态？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理解，牛天生的生理构造与习性造就了它们驯良与吃苦耐劳的品质；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更愿意从牛与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甚至于相互崇拜的关系中来解读牛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

在藏区，牛实际上被藏民们当成了“家人”。特别是牦牛，不仅仅成为藏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从牦牛身上获取的，以牦牛肉为主食，牦牛奶作营养饮品，牦牛皮毛制成衣服；牦牛也寄托着藏民们的精神信仰，比如对于白牦牛的崇拜，白牦牛经过超度后要放归自然让其自生自灭，白牦牛是不少山神的化身，又比如对于普通牦牛的尊重，只要不是在杀牛季死掉的，当地人对它们都要进行厚葬，有的还会请寺庙的喇嘛来念经。还有，今天行走在甘孜、阿坝、昌都等藏区，仍然能看见人们把牛的头骨、角作为灵物来供奉，或者镶嵌在石墙上供人视拜，甚至将刚杀的牛头供奉在房顶上以示尊崇。

由此看来，牛的温和与驯顺，也是与人长期相处的结果。还有，牛的气定神闲与安身立命，包括它的自由自在，固然还有工业文明的进步逐渐让牛从“蛮力”中解放出来了的因素，但是否也包含着牛在艰苦环境下磨炼成的吃苦耐劳和勤劳奉献的精神呢？包含着牛大智若愚、与人为善的低头智慧呢？

而这道美丽的牛的风景线，已然在温暖地揭示出一种民族向往和必然——脱贫攻坚，共同富裕，藏区人民正在用牛一般的勤勉踏实和奋斗精神走向幸福自由的生活，同伟大祖国一道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小说连载 南山

◎高亚平

就在狗蛋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急刹车，车停住了。狗蛋被人推搡着下了车，他一定神，咋又到了常宁路派出所？

依旧是审讯。不同的是，这次审讯狗蛋的，不是先前那几个警察，他们似乎比先前那几个警察凶。

警察简单地询问了狗蛋的简历后，接着就直奔主题，让狗蛋交代他送给小芳的那部玫瑰色手机的来历。他刚说了一句：“是在垃圾箱里拣的！”便被审讯他的警察抽了一耳光，喝令他老实交代。

狗蛋委屈极了，眼泪差点从眼眶中滚出。他嗫嚅着分辩道：“我说的是实话！”

警察不听他的分辩，让他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再说。并说，他们已知道了手机的来历，这是在例行公事，是在考验狗蛋，看他老不老实。说完，审讯他的警察点上一根烟，到室外抽烟去了。室内只剩下狗蛋和做记录的警察，俩人都紧闭着嘴，谁也不说话。室内的空气好像凝固住了，沉闷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门再次被推开时是在半个小时后，这次进来的不光是审讯狗蛋的那位警察，还有王力。听了审讯狗蛋的警察的汇报，得知案情没有丝毫进展，王力有点急，他特意赶过来看个究竟，看是否能经过他的开导，让案情有所突破。但令王力没有想到的是，他进房后，无论怎么审讯，狗蛋都是一句话，手机是捡来的。除此，再无二话。见状，王力大为气恼，他向两位警察丢了一个眼神：“让他到外面清醒清醒！”然后，气哼哼地出了门。

狗蛋被带出了门，铐在了派出所后院的一棵树上。

尽管到了晚上，但天气依然很热。狗蛋被铐到树上后，那个难受劲就别提了。派出所的后院原来是一个自行车棚，这几年，随着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车棚最终废弃，成了一个杂物间，里面不但堆满了落满灰尘、破旧不堪的自行车，还有一些破桌烂椅。除车棚外，就是几棵梧桐树，一棵榆树。梧桐树长得快，已有小桶粗，时值秋天，树叶蓊郁，阴翳了整个后院。就连车棚的顶上，也被树荫所罩，星月之光只能被筛下，斑驳于棚顶。而榆树呢，也许是冒出地面晚，也许是生长缓慢，则仅有椽子粗细，委屈地夹在梧桐树间，连叶子都是瘦瘦的，小小的。狗蛋就是被铐在这棵榆树上。起初，他是站着的，一个小时后，他实在受不了，干脆坐在地上。由于是背铐在树上，两只手臂不能来回活动，连蚊子叮他，他都没法驱赶。时间一长，他被叮得浑身奇痒，难过异常。加之天气又热，又喝不上水，狗蛋变得越来越焦躁。他开始大喊大叫，希望有警察到后院来，给他松了手铐。闹腾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他无望地耷拉下脑袋，大口喘气……

狗蛋再次睁开眼睛已是第二天的九点钟，他发现外面阳光很好，天空很亮。当他把目光收回，环视周围时，不由大吃一惊，我这是在哪里？医院吗？怎么还有警察？见他醒过来，守护他的警察，连忙走到床前，长吁一口气说：“好了，你终于醒了！想喝水吗？”狗蛋觉得说话的警察声音有些熟悉，扭头一看，这不是第一次审讯他的那位警察吗？他挣扎着想坐起来，被王建军按住了，“再躺会儿吧！”狗蛋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他在心里嘀咕道：同样是警察，咋就这般不一样呢？他还不知道，他被折腾得昏过去后，是被何远找人送进医院的。这个时候，何远正在派出所里，为他的再次被抓，为他被铐在派出所后院树上，正和王力吵得一塌糊涂呢。

正如俗语说的那样，“热闹处卖母猪”，在所务会上，何远还没有和王力就狗蛋的事儿论出个究竟，就被郑重的电话给打断了。郑重在电话里直接了当地说：“何远呀，咱们都是老同学了，你咋还给我来这一手呢？”

“你说啥呀？”何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啥？有人把你们告了，说你们打击处理弄虚作假！”

何远更糊涂了，“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了。”

“你赶快到局里来，去跟杜局长解释吧！”郑重说完，就挂了线。

何远举着手机，愣了半天神，终于没有弄出个所以然来。他只得宣布散会，开了车，火急火燎地往分局赶。路上，他又给郑重打了两个电话，但始终打不通。他索性不打了，是福是祸，见了局长再说。这样想着，功夫不大，就到了分局。他径直上到三楼，敲了敲门，进了局长办公室。

“杜局长！”何远赔着笑叫道。

杜平没有吭声，阴沉着脸，示意他坐下。何远刚坐下，杜平就随手从桌子上拿了一份材料，递给他。他接过一看，是分局打击处理考核表，常宁路派出所名列第二。

“你们所里这个成绩是真实的吗？”

“应该是真实的！”

“通易坊贩毒案也是你们破的？”

何远挠了挠头，好像没有听民警汇报过这个案子，是不是王力指挥人侦破的，他有些拿不准。“我不清楚这个案子，或许是教导员组织警力破获的吧？”

“你不清楚？”杜平用眼狠狠地剜着他说，“一句你不清楚就完事了？我说何远呀何远，你可是代理所长，是所里的一把手，所里的大小事儿你都得清楚，关了三个人的贩毒案，你竟然一点都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杜平越说越来气，不由“腾”的一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你现在就给我打电话，把这件事情给我弄清楚！”

（未完待续）